

# 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表现、影响及应对\*

黄河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逐步建构并主导了一套以自身为中心的二战史观，通过选择性记忆、制度化传播和文化再现，系统性边缘化苏联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这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历史叙事，在冷战格局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中不断被强化。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长期盛行严重扭曲了历史真相，不仅掩盖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巨大贡献，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误读正逐渐转化为现实政治策略，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出发，主动采取多维度的应对措施，纠正西方史观的偏误，扭转“历史失语”的被动局面。

**[关键词]** 二战史观 西方中心主义 记忆体系 历史主权 国家安全

历史从不是纯粹“过去式”的静态文本，而是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叙事不仅关乎对过往事件的理解，更深刻地嵌入现实之中，成为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作为20世纪最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历史叙事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逐步建构起一套以自身为中心的二战历史叙事体系。在这一叙事框架中，一场全球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被叙述为一场由少数“民主国家”主导的文明胜利神话。系统梳理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主要

---

\*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帝国主义本质新表现研究”（23&ZD326）的阶段性成果。

表现形态，有助于突破资本主义话语霸权对历史记忆的垄断，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意识形态安全。

## 一、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典型表现

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在讲述二战历史时，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叙事体系。在这一叙事体系中，西欧战场与英美军事行动被置于核心位置，而苏联在东线战场付出的巨大牺牲、中国长期抗日战争所发挥的战略牵制作用，以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事实，则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处理。

### （一）边缘化东线战场以及苏联在欧洲战场的决定性作用

在西方主导的战后史学叙事中，二战的胜利往往被呈现为“自由民主世界对抗法西斯的胜利”。其中，美国、英国及其盟军在西线战场的贡献被过度夸大，而苏联在东线的决定性作用却长期被边缘化。

事实上，在二战期间，东线战场无论在战役规模、人员投入还是伤亡强度方面，都远超西线战场，是决定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走向的主战场。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大举进攻苏联，标志着东线战场的全面展开。尽管苏联在初期遭遇重大损失，但随着战线深入，苏联逐步完成战时动员并形成全面反攻态势。1942年至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实现了决定性的战略反攻。该战役中，苏军歼灭了德军第六集团军，扭转了整个战争的进程，被西方历史学家理查德·欧弗里（Richard Overy）称为“欧洲战场的真正转折点”<sup>①</sup>。而在1943年7月爆发的库尔斯克战役标志着德军在东线战略攻势最后尝试的失败。战役之后，德军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苏联红军从这里开始了收复国土的全面进攻。库尔斯克会战同时也被视为欧洲东部战线的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关键转折点<sup>②</sup>。

与长期对德作战的苏联不同，美国和英国直到1944年6月6日才发动诺曼底登陆。西方历史书籍普遍将该事件视为战争走向胜利的标志，甚至被称为改变战争格

---

<sup>①</sup> Richard Overy, *Russia's War: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Effort: 1941 - 1945*, London: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1998, p. 185.

<sup>②</sup> Russel H. S. Stolfi, *Hitler's Panzers East: World War II Reinterprete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p. 224.

局的决定性一战。事实上，在诺曼底战役期间，苏军已在东线展开大规模的“巴格拉季昂行动”，击溃德国中央集团军，为西线减轻了极大的战略压力。苏联的攻势使德国在西线的防御体系迅速崩溃，而不是盟军登陆本身决定了战争走向。

1945年之后，随着美苏对立加剧，西方在史学、政治宣传与文化产品中逐渐塑造出“美英主导的反法西斯胜利”叙事，将诺曼底登陆塑造成解放欧洲的关键时刻，并系统性淡化甚至掩盖东线战场的核心地位。例如，美国的主流二战电影（如《最长的一天》《拯救大兵瑞恩》等）中极少提及苏联角色，将战争焦点完全锁定在西线与诺曼底，反复再现西线的英雄叙事。在冷战结束后，苏联在击败纳粹德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被进一步遮蔽，并发展为一种制度化的记忆工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东欧国家推动历史记忆立法，将苏联与纳粹并列为“双重占领者”。例如，立陶宛议会于2022年通过立法将苏联与纳粹同等定性为“外来压迫政权”。这一趋势不但扭曲了历史事实，更服务于北约东扩、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 （二）宣扬“苏德等同共谋论”，歪曲社会主义力量在二战中的形象

在当代西方史学与政治话语中，“苏德共谋论”已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该观点通常将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简化为“两个极权政权合谋瓜分东欧、引爆二战”的行动，并据此将苏联与纳粹德国并列为二战共同“发起者”。这一叙事不仅出现在部分西方史学著作中，也逐渐被制度化地纳入欧洲的公共记忆与教育体系。例如，2009年欧洲议会通过《关于欧洲良知和极权主义的决议》，正式将8月23日设为“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难者纪念日”<sup>①</sup>。该纪念日的设定恰恰是苏德条约签署之日，其意图显然是将纳粹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在象征意义上等同起来，将苏联战争受害者和主要战胜国的地位重新定义为与侵略者等同的“共同责任方”。这种“苏德等同共谋论”并非价值中立的学术判断，而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竞争的产物。它不仅在欧洲内部构建了“后冷战集体记忆”，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合法性的认知。

<sup>①</sup>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 April 2009 on European Conscience and Totalitarianism”,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6-2009-0213\\_EN.html#def\\_1\\_2](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6-2009-0213_EN.html#def_1_2).

### （三）宣扬“原子弹终战论”，构建“美国拯救世界”的神话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西方叙事中往往被简化为“美国拯救世界”的胜利神话，而所谓的“原子弹终战论”则是该叙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超过2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亡。西方主流史观认为这一行为是“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避免更多盟军伤亡”的“不得已之举”<sup>①</sup>。这一叙事在美国战后教材、影视作品中被反复重申，强化了“美国以科技与人道主义终结战争”的形象。然而，近年来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证明，日本在投降问题上的迟疑并非因为原子弹。日本知名历史学者长谷川刚（Tsuyoshi Hasegawa）指出，苏联参战对日本投降的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影响力超过了美国投下原子弹。“无论是内阁还是东乡本人，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7日下午，都认为没有必要改变政策，尽管大多数内阁成员已经知道这是一颗原子弹，而且如果日本不投降，可能会有更多原子弹被投在日本其他城市……广岛原子弹虽然增强了寻求终止战争的紧迫感，但并未促使日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推翻此前寻求莫斯科调解的政策……东乡于8月7日发给佐藤的紧急电报表明……长崎原子弹的影响微不足道，它并没有改变政治格局……相反，真正彻底改变日本统治精英观点的，是苏联参战。”<sup>②</sup> 苏联对日宣战立即打破了日本对“通过苏联调停”赢得有条件投降的幻想，是促成“无条件投降”的主要因素。

### （四）边缘化东方战场以及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

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二战史观在构建战争记忆时普遍采取“欧洲中心”与“美国主导”的历史框架，将东方战场降格为“次要战区”，并将中国抗战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中边缘化。然而，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不仅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战国，更是东方主战场的核心力量，对战争结局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澳大利亚学者萨莉·西图（Sally Sitou）指出：“如果将此（东方战场）视为强大的西方国家出手拯救无助的中国的故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实际上是中国将自

---

<sup>①</sup> Thomas W. Zeiler, *Unconditional Defeat: Japan, America,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ilmington, DE: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sup>②</sup> Tsuyoshi Hasegawa, “The Atomic Bombs and the Soviet Invasion: What Drove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5, No. 8, 2007.

己视为全球共同体的一员，与法西斯主义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故事。”<sup>①</sup>

中国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进入全面抗战状态，是世界上最早对法西斯国家展开全面战争的国家。在1937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年间，中国几乎孤军奋战，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60%以上。1941年前驻扎在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超过40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绝对多数。正因中国战场的长期牵制，日本未能集中力量进攻苏联或过早进攻东南亚，为盟军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国付出3500万人员伤亡、逾万座城市村镇被毁的沉重代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石。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不仅体现在兵力消耗和时空拖延上，更在于抗战形态的深度社会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人民战争，使中国抗战突破了单纯的战争逻辑，形成了敌后长期作战的纵深体系。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相继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不仅在地理上把日军的占领区切割成若干孤立块，还通过破袭交通线、摧毁仓储、瓦解傀儡政权，使日军始终无法将沦陷区完全转化为战争资源供应地。日军被迫长期投入2/3兵力进行治安战，机动作战能力不断削弱。从全球战略角度看，日本在中国大陆遭遇了一个无法清除的消耗陷阱，其对外扩张能力受到极大约束，其侵略步伐受到极大遏制。然而在许多西方教材中，中国常被模糊处理为战争的受害者而非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

在西方教材、纪录片与博物馆展示中，中国抗战通常以“飞虎队”“驼峰航线”这类美援叙事为主。例如，美国国家二战纪念馆关于中国抗战的展区标题为“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太平洋战争的第二战场”（China-Burma-India: The Pacific War's Second Front），在主屏幕交替播放着战时中国补给路线的动画地图和喜马拉雅山的环境视频<sup>②</sup>，在专题文章中也只是提出“中国在苏联、美国 and 英国等国的非正式援助下继续抵抗”<sup>③</sup>，无视中国自主抗战的主体地位。这种叙述强化了“美国主导

---

① Sally Sitou, “On Our Side: Remembering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 China’s War”, <https://www.sydney.edu.au/news-opinion/news/2015/09/03/on-our-side--remembering-the-national-and-international-in-china.html>.

② The National WWII Museum, “Road to Tokyo”, <https://www.nationalww2museum.org/visit/museum-campus-guide/campaigns-courage/road-to-tokyo>.

③ “Liberation in China and the Pacific”, <https://www.nationalww2museum.org/war/articles/liberation-china-and-pacific>.

战争，中国被动参与”的隐性结构，使得中国抗战贡献完全被掩盖。战后美苏冷战形成后，西方学界与政界出于反共立场，主动淡化甚至删除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内容。在大英百科全书的二战相关内容中，仅有两个词条说明中国对日作战的内容，其篇幅甚至少于缅甸、菲律宾和印度，未提及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持久打击<sup>①</sup>。这种选择性叙述反映出西方对中国历史贡献的系统性忽视。

#### （五）消隐左翼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

在由西方主导的二战叙事体系中，不仅苏联和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贡献被淡化，欧亚各国左翼力量的作用也遭到边缘化，甚至被彻底抹去。然而，事实上，左翼政治力量及其所组织的人民抵抗运动在欧洲和亚洲多个战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缺席并非历史偶然，而是战后西方选择性书写历史的结果。

在欧洲战场，自1940年起由法国共产党组织的人民抵抗力量<sup>②</sup>，在法国内部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共产党是德国占领时期建立系统化全国抵抗网络的力量，对破坏德军通信交通线、组织地下印刷和支持巴黎解放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冷战后形成的西方主流叙事中，这一历史事实却被刻意淡化。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吉尔德亚（Robert Gildea）就曾指出：“共产党在抵抗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sup>③</sup>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意大利。二战期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意大利反对法西斯政权的主力，拥有超过18万人，在意大利北部牵制了法西斯政权的六个师，英国的报告中也指出：“如果没有游击队的胜利，盟军就不会在意大利取得如此迅速、如此压倒性且如此轻松的胜利。”<sup>④</sup>然而，这些左翼抵抗力量在战后欧洲历史叙事中被有意压制。在亚洲战场，这种历史遮蔽同样存在。

---

① Britannica, “More Articles That Discuss World War II”,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World-War-II>.

② Robert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A New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79–80.

③ Robert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A New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

④ Tom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Fascists, Guerrillas and the Allies*, London: Pluto Press, 2009, p. 1.

菲律宾的胡克巴拉哈普（Hukbalahap）游击队对日军发动了持续三年的敌后武装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功，击毙了众多日军<sup>①</sup>，甚至迫使日军因害怕夜间遭到袭击而撤退到舰船上<sup>②</sup>。然而，战后美军占领当局不仅拒绝承认其合法地位，反而将其定性为“共产主义叛乱”。西方的历史叙事有意淡化人民战争的传统，不愿承认反法西斯战争拥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基础，更不愿承认战争的胜利是各国人民群众共同斗争的结晶。

#### （六）抹杀殖民地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

西方主导的二战叙事系统性忽视了殖民地人民在战争中独立发挥的作用及其所承受的巨大牺牲。他们不仅被迫贴上“帝国军队”的身份标签，其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事实也被去政治化和去主体化处理，被排除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流叙事之外。这种叙事结构掩盖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维护殖民体系的历史合法性。

二战期间，英属印度动员了逾 250 万名士兵，成为盟军中规模最大的“非白人军团”。他们广泛参与了北非、中东、意大利、缅甸等多个战场的作战行动<sup>③</sup>。然而，在英国官方的二战纪念活动中，这一群体被刻意淡化，相关记述通常仅以“帝国军队”一词草草带过。在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内，对于英属印度军团的展示仅限于二战展厅中的一个简略展柜<sup>④</sup>。类似情形也在法国上演。数十万来自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摩洛哥等法属殖民地的士兵在北非、意大利等战场奋勇作战。然而，战后法国并未给予这些士兵应有的荣誉和福利，这些曾为盟军浴血奋战的殖民地军人迟迟未获应有的认可。直至 2016 年，法国方才为幸存的塞内加尔退伍士兵补发了应

---

① “Hukbalahap Rebellion”,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Hukbalahap-Rebellion>.

② Colin Minor, “Filipino Guerilla Resistance to Japanese Invasion in World War II”, *Legacy*, Vol. 15, No. 1, 2015.

③ Annu Palakunnathu Matthew, “The Unremembered Indian Soldiers of World War II”, <https://quod.lib.umich.edu/a/ars/13441566.0051.009/-/unremembered-indian-soldiers-of-world-war-ii?rgn=main;view=fulltext>.

④ Imperial War Museums, “Second World War Galleries”, <https://www.iwm.org.uk/events/second-world-war-galleries>.

有的养老金<sup>①</sup>。

更重要的是，殖民地人民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命令的消极服从者，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展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亚洲，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抵御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奠定了民族独立的重要基石；在非洲，坦桑尼亚、加纳、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退伍士兵，成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然而，殖民地人民的参战动机与主流西方叙事中“为自由世界而战”的论调存在根本性矛盾。对于殖民地人民而言，二战并非纯粹的“反法西斯战争”，而是“反法西斯—反殖民”的双重斗争。这种斗争在战后未能获得正面描述，反而被刻意排斥于国家记忆与国际共识之外，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刻意选择，其目的在于维系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结构。如学者穆赫姆西·姆瓦基赫韦洛（Muhemsi Mwakihwelo）指出：“帝国主义的抹杀不仅限于苏联（现在还有俄罗斯）。全球南方国家对盟军胜利的物质和人力贡献也同样被否定。”<sup>②</sup>

## 二、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影响及危害

西方主导的二战历史叙事，是在特定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框架下形成并不断再生产的话语体系，逐步塑造并固化了影响全球历史认知的主流框架。这种结构性叙事在塑造全球对二战整体认知的同时，也在现实层面重塑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道义叙事与合法性根基。

### （一）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二战叙事制度化

自二战结束至冷战时期，美西方国家逐步构建了一套以自身为核心的历史话语体系。该体系通过多渠道协同运作，将二战叙事塑造成有利于西方形象和利益的版本。西方不仅在内部巩固战后“胜利者”的国家认同，更在国际层面输出其价值

---

<sup>①</sup> Julien Sauvaget, “African Soldiers: France’s Forgotten War Heroes Finally Given Full Pension Rights”, <https://www.france24.com/en/tv-shows/focus/20230104-african-soldiers-france-s-forgotten-war-heroes-finally-given-full-pension-rights>.

<sup>②</sup> Muhemsi Mwakihwelo, “Victory Day: Reclaiming the Global South’s Legacy”,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5/06/09/victory-day-reclaiming-the-global-souths-legacy/#:~:text=Imperialist%20erasure%20extends%20beyond%20the,Allied%20victory%20are%20similarly%20negated.>

观，为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奠定合法性基础。美国、英国等国家将自身塑造成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强支柱，营造出“自由世界拯救人类于水深火热”的叙事神话。在教育体系方面，西方通过教材编撰和学术研究确立了其二战叙事的基本基调。在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将“诺曼底登陆”“广岛原子弹”定为二战的核心章节，而中国抗战往往仅作为“区域背景”被简略提及。在纪念日与仪式方面，西方国家通过官方纪念活动和纪念日制度来强化特定的叙事框架。每年5月的欧洲胜利日，欧美各国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而9月3日的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常常在西方舆论中被忽视。在影视文化领域，大众娱乐产业长期扮演着巩固西方叙事的关键角色。《拯救大兵瑞恩》《敦刻尔克》《奥本海默》等经典二战影片，将盟军在欧洲的英勇表现和美国的科技力量描绘成决定战争走向的核心因素，在有意无意间塑造了全球观众对于二战历史的集体认知。西方借助娱乐产业巩固了自身“正义胜利者”的形象，促使西方叙事在国际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 （二）西方错误二战史观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西方主导的二战历史叙事，并非单纯对既往事件的事实性复原，而是深刻嵌入民族集体记忆、价值认同与历史意义建构过程之中的重要话语资源。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的，集体记忆的框架并非事后由个人记忆的组合构建而成，集体记忆是用来重建过去形象的工具，这种形象在每个时代都与社会的主流思想相一致<sup>①</sup>。当西方主导的错误二战史观在全球传播时，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造成冲击。这种冲击并不表现为对具体史实的直接否定，而更多体现为叙事重心的转移与意义层级的重新排列。

在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叙事逻辑中，决定战争走向与胜负归属的关键节点往往被集中设置在西欧战场与美英主导的军事行动之上，而中国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则被有意无意地处理为全球战争背景中的地区性冲突或外围战场。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中国抗战更多被赋予“牵制”“配合”的色彩，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意义、历史主动性和巨大牺牲，逐渐被压缩为背景性叙述的一部分。这种叙事并非对史实的直接否认，却通过意义弱化和位置边缘化，实质性地消解了中国抗战在世界

---

<sup>①</sup>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40.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从而导致对抗战历史的碎片化认知以及对抗战功绩评价的模糊化倾向，为历史虚无主义创造了滋生蔓延的空间。如一些人在西方话语影响下，过度抬高外部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当抗战历史被叙述为“外力主导”的结果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历史地位，也随之被削弱甚至否定。

### （三）西方错误二战史观正外溢为战略风险

西方错误二战史观对历史的扭曲和选择性记忆，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本应拥有的历史话语权。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几乎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功劳归于美英等西方大国，而对中国14年抗战的牺牲与贡献知之甚少。这直接导致我们以二战受害者与胜利国的身份发声时，往往难以得到广泛共鸣，甚至会被误解为“重提旧事”“渲染民族主义”。这种历史叙事劣势让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西方借助其叙事霸权将二战记忆工具化，构筑针对中国的舆论武器，服务其对华的战略遏制。

与此同时，西方错误的二战史观削弱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的共识，进而消解了中国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正义的努力。由于冷战和地缘政治的需要，西方国家在战后迅速接纳了日本，将其视为遏制中国的先锋。因此，在历史问题上，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态度，对日本国内出现的美化二战、否认侵略的言行缺乏有力的谴责。美西方有意无意地将日本塑造成“战争受害者”的对象，而非一个需要全面反省侵略历史的施害者。日本右翼势力利用西方给予的模糊空间，大行历史翻案之举。

## 三、应对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国家策略

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长期盛行严重扭曲了历史真相，不仅掩盖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巨大贡献，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误读正逐渐转化为现实政治策略，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出发，主动采取多维度的应对措施，纠正西方二战史观的偏误，扭转“历史失语”的被动局面。

### （一）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叙事体系

面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在二战叙事中的结构性优势，中国

亟须从战略高度出发，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叙事体系。这一构建过程应立足于严谨的史学研究、遵循国际学术规范并契合跨文化传播逻辑，形成兼具学术说服力与国际可接受度的系统性叙事。一方面，持续推进中国抗战史的全球化研究与国际化出版，将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成果有机嵌入国际二战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之中。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对二战的研究体系在语言、资料获取和研究传统等方面存在显著壁垒，中国抗战史往往被置于区域史或补充性案例的范畴。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以高质量、具备对话性的学术成果融入国际主流学术体系。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正式推出，法文、德文和阿拉伯文版本也在稳步推进。该系列不仅在内容上系统展现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整体地位，也在体例、注释体系和史料运用方面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有助于提升中国抗战史研究在海外学界的可引用性与可信度，推动中国抗战史从个别成果输出向体系化传播转变。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国际史学界的前沿关注点，将中国抗战史研究纳入“全球战争”“总体战”“殖民体系与反殖民斗争”等国际通行的分析框架。通过强调议题的共通性而非单方面突出中国抗战的特殊性，增强中国叙事在国际学术讨论中的嵌入程度，使中国抗战史不仅能被关注，更能为国际学术研究所需。这种嵌入式叙事有助于打破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史学视角，从内部推动国际二战研究范式的变革。

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叙事体系，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工程，其核心并非与西方叙事形成简单对立，而是通过持续、高质量的学术生产与国际传播，逐步确立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应有地位。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削弱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结构性优势，为国际社会形成更加全面、真实和多元的历史认知提供中国方案。

## （二）加强历史观的教育

在全球话语权的竞争中，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面对西方对历史叙事的长期垄断，中国需要在教育、媒体、意识形态等层面同步发力，将历史观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建立起与领土安全、网络安全同等重要的历史安全防线。

第一，系统性构建抗战叙事的基础性资料体系，增强统一、权威的史料支撑能力。当前，中国抗战史研究与传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并非史料不足，而是史料

分散、呈现形式碎片化，难以支撑持续且系统的国际传播。因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推进抗战叙事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整合国内各级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以及高校研究机构所掌握的抗战档案资源，建立统一的抗战叙事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仅要完成史料的数字化与标准化处理，还应在内容编排上凸显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使其既能服务于学术研究，又具备对外传播和公共教育的功能。通过权威资料体系的集中展示，改变对外叙事中“各执一词”“以零散史实对抗宏大叙事”的被动状况，为后续的教育、文化与对外传播提供稳定的知识源泉。

第二，系统性充实抗战史教育内容，强化抗战在国内历史认知体系中的地位。在教育领域，不应仅将抗战史作为民族史或近代史的一部分进行讲授，而应有意识地将其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框架中加以阐释。通过修订中小学历史教材结构，在初高中阶段设置专题化教学单元，着重解答“中国抗战为何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如何深刻影响二战总体格局”等关键问题，引导学生领会抗战的国际意义与世界价值。同时，应避免单纯灌输结论，而是借助史料对比、战场结构分析和国际互动视角，助力学生形成相对完整的历史认知逻辑。通过教育体系的系统强化，使抗战史在国内历史叙事中不仅被铭记，更被理解，从而巩固社会层面的历史共识基础。

第三，完善历史叙事的治理与保障机制，防止西方错误二战史观对青少年认知的长期侵害。在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歪曲问题时，应避免事后被动应对，而是通过制度化治理提升前瞻性和稳定性。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对教材、媒体报道、影视作品及网络平台中的历史内容进行常态化评估，重点关注对抗战历史的重大遗漏、失实呈现或刻意淡化现象。在此基础上，通过明确法律责任界限和行业规范，引导社会形成对历史问题的基本共识。同时，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应加强与主要平台的合作，对明显歪曲抗战史实的内容进行事实核查提示或权威信息引导，降低西方错误二战史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风险。通过治理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维护抗战历史叙事的基本严肃性与公共认知秩序。

### （三）扩大国际传播与对话合作，强化叙事影响

中国需积极走向国际，通过多边文化交流、联合纪念活动、学术互访等途径，引领构建全球“多边记忆网络”，使中国的抗战历史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与传播影响力。

第一，借助跨国博物馆与纪念馆的联合巡回展览，重塑国际公众对中国抗战的感性认知根基。相较于文字叙述，博物馆与纪念馆所蕴含的实物史料以及空间体验，更易打破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壁垒，达成跨文化理解。故而，通过与海外重要的战争博物馆、历史纪念馆开展合作巡回展览，将与抗战相关的档案、实物以及多媒体展示有系统地引入当地公共文化空间，并配套举办专题讲座、学术导览以及公众交流活动，能让国际观众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领会中国抗战的地位与意义。尤其应当让熟悉国际史学话语体系的中国学者参与讲解与对话，以学术化的方式回应长期存在的认知偏差，从而使跨国巡展切实发挥文化外交的作用。

第二，以常态化的学术交流为切入点，构建抗战史研究的跨国、多语种对话机制。国际历史认知的转变，离不开长期稳定的学术互动机制。为此，可以设立面向海外的抗战史国际交流奖学金或者访问研究项目，吸引不同国家、不同学术背景的青年学者投身中国抗战史研究。通过联合研讨、档案研修以及多语种论文发表，逐步形成跨文化的研究共同体。在此过程中，鼓励学术讨论围绕史料、方法以及比较视角展开，而非进行预设结论式的交流，让中国抗战史研究能够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史学讨论框架，进而提升其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可见度。

第三，深化海外民间交流以及本土化传播，推动抗战叙事融入具体的社会语境。相较于宏大叙事，小规模、本土化的交流活动往往更易产生持久影响。在部分具有历史关联的国家和地区，结合当地的研究传统以及社会记忆，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民间交流项目。例如在英国或东南亚国家，围绕远东战场、中国远征军援缅作战等具体历史议题，邀请当地学者、历史研究者以及相关历史见证者，与中方研究人员一同回顾战争经历，并通过当地媒体或公共论坛进行传播。这种以具体战场、具体人物为切入点的交流方式，更易引发当地公众的情感共鸣，逐步提高中国抗战叙事在国际社会中的认知度与接受度。

(黄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丁琪]